

HOUXIANDAXING DE
ZHEXUE HUAYU

后现代性的 哲学话语

——从福柯到赛义德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从福柯到赛义德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 / 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1 (2001.12 重印)

ISBN 7-213-02080-3

I. 后… II. ①汪… ②陈… ③马… III. 哲学学派，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文集 IV. B0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847 号

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从福柯到赛义德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42.3 万
插 页 2
印 数 3001 - 6500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080-3/B · 74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HOUXIANDAIXING DE ZHIXUEHUAYU

C O N G F U K E D A O S A I Y I D E

出版前言

后现代是 60 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哲学和思想潮流，它深受尼采、弗洛伊德的影响，而表现出深刻的怀疑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倾向。后现代的批判目标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和理性主义传统，它旨在将这种形而上学信仰体系捣毁。后现代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正是他们的思想和著述使后现代思潮迅速地传播开来。直到今天，后现代理论在西方的人文科学领域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近 10 年来，后现代在中国引起了极大争议，对后现代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基于此，我社组织翻译、出版了《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所选作者均为后现代思想的代表人物，所选文章也是反映他们核心思想的论文及代表作的节选。我们推出这样一个后现代选本，是为了向中国读者提供后现代理论的诸种声音，以期引起对后现代思潮更深入的讨论。

后现代是一种西方思潮，它本身十分复杂，也十分艰涩，书中的观点并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我们只是给学界、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西方当代思想的选本，以资借鉴，从而推动我们自己的学术进步。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后现代性的谱系

长期以来,我们生活于总体性的信念中。总体性是什么?在尼采之前,总体性如此普遍,如此深入人心,如此自然而然,以至我们对待它就像对待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从不对它质疑、反诘,从不对它投以好奇的一瞥,它从未成为我们的知识对象,从未等待我们的清理、打扫,从未引起我们的驻足,总体性是我们所思、所为的毋庸置疑的指南。确确实实,总体性犹如空气,我们每天都在呼吸它,受它支配,听命于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它,而且我们根本就没有看见它的意图、打算和心愿。

我们可以从身体的角度来观察一下总体性的活动机制。身体因为纳入了一个总体性的框架内而丧失了其肉体性,总体性要求局部环节牺牲、忽视它的部分本性从而流畅和谐地融入它的构架内。在此,身体不是自治性的,它应屈从于一个更高级的系统,它被归并入一个大的组织内。在这个总体性的组织中,那些外溢式的,与该组织有冲突性的粗暴强力就应被砍掉、除去和灭绝,总体性要求的是秩序、纪律,它需要因果式的逻辑链条,它需要在理性的轨道内的解释说明,它需要相互连接的论证分析,它需要一环套一环的紧密的同质结构。身体,因为总体性的这些内在要求,这些内在压力,它呈现的就是理性器官的一面,它被视作是意识的载体,我思的物理器官;它等同于头脑、思维和认识,等同于一个知识主体和理性主体。这样,身体才能容纳于高级的秩序体内,才能获得恰如其分的位置,才能确保一个正常的知识体的流通运转。

在此,我们清楚地看到,总体性压制了身体的感性面,身体只是将自己

交付于一个理性他者,交付于一个无法目击到的理念,交付于高高在上的上帝或者魂灵。身体在此是第二性的,它需要被管制、被束缚、被理性引导,被魂灵鞭打,而身体内在的潜能,它的活生生的欲望,它的蓬勃的本能,它的粗糙的肉体性,在总体性的框架内,只好委屈地收藏起来,隐而不现。

从某种角度上说,总体性等同于形而上学,它们压抑和迫害一切异质性的东西,阻滞一切节外生枝的活力。它们对待身体的态度,也就是对待一切异质性的态度,是对待一切感性物的态度,身体不过是感性物的一个特例而已。在总体性和形而上学那里,身体、感性、欲望、迷狂、疯癫、邪念,因为它们的变动不拘性,因为它们充分的活力生产,因为它们外溢的莽撞蛮横,因为它们草率的强力意志,因而,它们必须被绳之以法,从而确保总体性的通畅,确保证理的威权,确保秩序的严谨,确保真理的贯彻实施。

这就是总体性的信念,是我们不由自主深陷其中的形而上学公理,也是我们毋庸置疑的日常生活指南。从柏拉图开始,它就深入人心,像地貌一样沉积下来,谁还会对这种深厚而久远的哲学地貌进行无礼的翻掘呢?

然而,在形而上学的彬彬有礼的绅士般的哲学传统中,一个粗野的村夫闯进来了,他抡着斧子大砍大杀,他尖锐地咆哮,发疯似地颤抖,偏执地斥骂,形而上学成为他去之而后快的疾病,这就是尼采的形象。尼采不仅仅使形而上学转向,他还根本性地使之扭断。尼采,这个哲学另类和不可一世的孤傲天才,使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坍塌了。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后现代性潮流正是对形而上学的诋毁的话,后现代性正是将形而上学视作对手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尼采播下了后现代的理论种子,点燃了埋藏于地底的蓄势待发的突突的后现代火苗,这种火苗,我们今天已经十分清楚,是由德里达和福柯使之变为熊熊燃烧的状态的。

我们还是从身体着手看看尼采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这种分歧不是有限的分歧,不是可以通过有限的妥协而加以弥补的分歧,不是在另一个更高级的系统内可以化解的分歧,这种分歧是毅然决然的,是没有余地的,是水与火式的分歧。尼采挑衅式地指出,身体应从理性组织中解放出来,它不再是一个收缩式的小心翼翼的惟恐出错的依附性器官,身体应勇于承认它

的肉体性,承认它的感性,承认它的生物性。尼采第一次为身体中的活力正名,为身体中强健的创造性,为身体中潜藏的能量、欲望、野性正名。身体在某种匿名的力的带动下舞蹈起来,它无所顾忌,目空一切,敢做敢为。它断然剪除了与上帝的牵连,与灵魂的牵连,与意识的牵连,与知识的牵连,它的重心不再处于上部,而位于下部。正是身体以及类似于身体的异质物的这种放纵性,这种迷狂和莽撞,总体性的大坝,形而上学的牢固堡垒才被冲垮。正是在此,我们才触摸到了后现代性的脉搏,它不是别的,它只是一种异质性的爆炸式释放。

总体性的内核是本质主义。本质是一块巨大的支撑性基石,形而上学就是在这块基石上缜密地搭建的。它布局严谨,层层衔接,结构紧凑,井然有序。它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巨型系统,是一个控制性的大厦,是一个内敛的支配机器,有巨大的吞噬能力和整合能力。形而上学的力量之源,它的交汇点,它的核心就是本质、起源。事物总是围绕着它生长、裂变、演进、蔓延。本质通常处于感性之外,它无法目击而又无处不在,它一会儿是理念,一会儿摇身一变为上帝,一会儿又是极其自信的“我思”,在某个具体的历史瞬间,它甚至可能是一个抽象化的个人,也可能是个匿名的信念或物事。本质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先性,它总是先人一步,高人一筹,它的派生物、奠基于其上的枝枝叶叶,总是围绕着蓓蕾似的本质发芽、生长、绽放,它们对本质的偏离是有限的偏离,对本质的损耗是有限的损耗,对本质的污染是有限的污染。本质是伟大的秘密之所在,是运动、位移、摇晃的支点之所在;本质是阳光尚未升起的地平线,是波涛滚滚的大海底下的暗流。本质既由于它的隐蔽性,又由于它绝对的优先性,它需要复原,需要耐心地求证,需要反复地回溯,需要破除迷雾般的倒逆。因为这样毋庸置疑的种子性,本质就成为知识的目标,知识所意图采摘的果实。本质主义就成为恒久的认识论、信念和哲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起源式的本质论,它的优先性和高贵性,遭到了全面的质疑和讥讽。尼采嘲弄而又有点恶作剧地指出,人的起源处站立着的是猴子。后现代理论正是将本质作为一个巨型幻觉来祛除的:不存在某种单一

起源物,不存在某种确定无疑的同一性和纯洁性,万物没有共同起源,或者说,万物的起源各个有别,它们成千上万,互不关联。在所谓的本质处,站立着的是偶然、机遇、运气和莫名其妙的怪诞。本质不是必然的,不是不言而喻的,它不过是后来者的臆想、幻觉,是别有用心的累积和混淆视听。本质最终是卑微的,是微不足道的,自命不凡的本质不过是些小把戏,小花样,小计谋。

表象取代了本质,差异代替了同一性,物质代替了理念。这是后现代性对本质论的最尖锐的清理,正是在此,形而上学大厦倾倒了,形而上学的那块本质性和控制性基石被清除了,理性链条和逻辑绳索解开了,表面不再为一个幻觉式的本质所支配,表面理直气壮地成为表面本身;细节不再委屈地跻身于体系之间,细节也能独自活动、闪现、发光。严密的系统组织现在为一种平面式的无政府的差异系统所取代。差异,绝对的差异,是后现代性的律令,差异搅乱了一切等级制,搅毁了一切的支配与屈从,搅毁了一切的霸权与反霸权,搅毁了一切的绝对性和同一性。差异正是本质主义的不共戴天的仇人,是它的死敌,本质主义是严肃、残酷、冷漠无情的,差异展现的则是嬉戏的脸孔,它是宽容、平等、轻松和诙谐的,它是欢闹的,笑声朗朗的,是开放而又无拘无束的。因为它没有本质、起源,它就没有需要臣服的国王君主,它也没有回溯、求索、复原的崇高而痛苦的使命。最终,差异让事物返回事物本身,让事物从对他者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让事物摆脱其固有的臣属性。物与物之间,或者,让我们更贴近德里达的意思,符号与符号之间,铲除了令人生厌的因果关系,它们之间只是纯粹的无功利性的嬉戏关系。在这种嬉戏的系统里,只有无始无终的符号播撒,只有自发的爆炸性的文本力量。播撒和爆炸,却没有方向感,没有引爆的内核,没有能量起源,它们是无拘无束的突破,是空洞而放肆的邪恶逾越。

对本源的清理也就是对真理的清理。本源和真理是一体式的,本源正是真理之所在,本源的优先性就在于它自恃的真理性,它总是正确的源泉。现在,那个毋庸置疑的本源消失了,那个派生性的内质被视作是卑微的,被视作是幻觉、发明,被视作是庸碌的差异项,那么,它的品质,它的真理性也

随之坍塌了。真理,因为它的绝对性、自我确证性和独一无二性,还因为它的高贵性和优先性,毫无疑问,它也是控制和压抑式的。真理总是以虚假为前提,它是在同虚假的嗜血斗争中确立的,真理总是植根于坚实的土壤,它毫不松动,毫不摇晃,毫不颤抖;它稳固而自信,它既是知识搜寻的目标,也是知识活动的依据,知识总是在真理的轨迹内起舞,脱离了真理,知识就失去了航向,变成迷途的无所作为的羔羊,最终,知识就丧失了作为知识的凭据。

那么,那些假象,那些为真理所排斥之物,那些无从定型,无法纳入真理轨道内部的异质物就要遭到践踏,遭到永久的流放吗?真与假水火不容吗?我们真的要顺从这种霸道的、一神论的真理观吗?尼采首先发现了真理的不稳性,真理的绝对性让位于相对论:真理不是纯净无瑕、光明剔透的;真理不是地球外部的闪耀的恒星。真理总是被污染,被权力和欲望所污染,真理因而是即刻、暂时和瞬间的。这样,真理就失去了古典意义上的真理性,它见风使舵,任人支使,听命于时势,听命于权力,听命于具体的环境,最终,真理总是和利益相结合,它是利益的托词、借口,它不再是亘古不变的教条、法则,不再是无往不胜的指南,不再是确定无疑的信念。真理是福柯意义上的一种事件,一种社会网络中的话语实践,一种具体而微的权力工具,一种操纵性的隐秘手段;它是社会空间内权力游戏的道具,是遮人耳目的伪真理,是一种纯形式的真理,是人为指派的强加真理。真理总是假借真理之名,进而掩盖它的虚假、相对性、闪烁其词和临时性。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永恒的真理借口,这种真理借口的背后是统治、操纵、压迫、支配,最终只是狡诈的利益要求。对待真理的恰当态度是:剥掉它的面纱,让它赤裸裸地暴露它的野心、欲望和权力。真理的重量等价于飞溅的唾沫。

真理不再像暗礁一样埋藏于大海的深处,现在,吸引我们目光的只是一览无余的海面。于是,我们回到了表面哲学,这正是后现代性抛弃本质和真理的必然归途。本质和真理要么位于底部,要么位于上部,它需要纵向的挖掘和搜索。但是,表面哲学既不俯视,也不仰视,它只停留于表面,停留于平静的对象外观,停留于纯粹的外部性和物质性。它破除了内/外模型,

高/低模型,它摒弃了深度迷信。在此,我们碰到了鲍德里亚的理论。外在的符码、模型、幻象不再是本质和真理的显现、发光、反映,它不再是冰山浮出海面的一角,它不再是影子式的辉光,它有自身的重量、厚度、物质性,它不再是再现性的手段,它就是它自身的对象。符码和幻象终于不是轻浮的记号,它开始有了自己的密度、力量。在鲍德里亚这里,古典的再现论不是简单地摒弃了,而是彻底地逆转了。符号、模型、幻象,这些一度认为是二度呈现物的东西,现在则不可思议地成为决定性的东西。现实,那个被视作具体实在的生活本身,正是符号和模型的操纵结果:真实生活令人惊异地尾随着类像前行,大规模的类型符号在导引、在决定、在支配。

这同后现代性的语言论暗中契合,语言不再透明地照亮这个世界,它不是覆盖于这个世界的面纱,不是抵达物质世界的通道。语言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词开始发现了自身,它向自身折叠起来,向自身收缩、合拢、集结、凝聚,语言不再是事物的光彩、影子、窗户,它是自己的窗户,它折射自己,它不是在和外物的交往中表现、行动、逞强好胜,它是在自身内部,在词与词的关系中,在句中蹦跳的字词组合中,在无始无终的词语嬉戏中,在骚动与喧哗的文本中闪烁、跳跃、舞蹈。

语言现在不是事物的外在器官,语言就是物,语言组织了它的重量、密度和土壤,词开始在语言自身的土壤中发芽、成长、结果。语言是一个巨大的封闭性的差异系统,它停止了呈现,在一个密封的轨迹里尽情地嬉戏。词,斩除了它的外在概念意义,斩除了它的人为的外向所指,而保留了它的物理形态,保留了它的书写、声响、笔痕、印记。写作因而不是将再现作为目标,将透视作为目标,而是将字词、语言、符号帝国作为目标;写作即是构筑一个空的没有指令、没有管制、没有独裁的符号帝国。文本的物质力量不是借助于外物,不是借助于文本“再现”出来的力量,不是借助于文本运作于其中的机制;文本力量来自于纯粹的文本性,来自于神秘而玄妙的文本性,来自于莫名的符号系统,来自于一个坚不可摧的隐秘而孤独的符号世界。这个符号世界,这个匿名然而又有着丰富物质性的语言系统,它自我做主,惟我独尊,恍恍惚惚而又悠哉游哉。

在此,语言本身也构成一种知识对象,它构成一种客体,一种有待探究之谜,一个有待开发的知识矿藏。这样,语言不再被视作是一个自然的中介了,不再毫无疑义地被看做通达其他知识的途径了,不再是想当然地成为秘密知识的发光体了,不再确信为真理的敲门砖了。相反,语言现在成为遮蔽、掩盖、变形、混淆视听的盲目力量。语言,因为它的厚重性,因为它的自主性,因为它内部的差异与重复,它和世上的不计其数的知识并驾齐驱。它们并列于同一个平面,比肩而立。它不再是诸知识体的一个可通约的公分母了,不再是任一知识体可借助的照亮灯具了,不再是普天之下的一个公共财产了。语言,在后现代理论那里,有了自己的品质、特性、土地、家宅,最终,它构成了一个封闭式的无国王的王国。

主体一度被认为是语言王国中的国王,它掌管着语言的命运。它从几个方面控制和操纵着语言。主体凌驾于语言之上,语言是主体的表述、工具、手段,主体可以随意选择、运用、支配和宰割语言,主体首先是操纵语言的主体,语言的形态、面貌、节奏、韵律都有赖于主体的分类、挑选和清理。主体和语言的操纵和被操纵的关系,主体对语言的居高临下态度,在后现代性理论那里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语言不再是主体的功能,相反,主体则成为语言的功能。语言是一个有巨大吸附力的陷阱式的体系,主体被语言吞并,收起了它由来已久的飞扬跋扈,在语言面前躬腰垂首。语言,以其物质力量,以其完善的系统性,以其顽劣的惰性,将主体卷入、收藏、刻写其中。在巨型的语言的吸附力量面前,我们这些主体难道不是陷入手足无措的地步吗?我们这些主体难道不是经由语言跨入了异化的门槛吗?难道不是陷入了拉康式的符号秩序中从而付出臣服的代价吗?难道不是在一个规范化、条理化的系统内遵纪守法吗?难道不是类似于一个身陷囹圄式的语言囚徒吗?我们说,我们写,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存在意义上的生存,不都是处在一个规范化的先在的语言世界之内吗?我们夸大的主体,臆想的主体,膨胀的主体,最终不得不令人沮丧地承认,也是一个卑微的主体,低贱的主体,盲目的主体。

主体不仅是卑微的,还是分裂的。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主体内部不再

是统一的,完整的,不再由“我思”、由意识来整体性地把握、持存。主体内部蕴藏着凶猛的不可遏制的能量,它气势汹汹,横冲直撞,不可一世,难于驾驭。主体内部流淌着的是差异的血液,它们构成诸力的冲突嬉戏;主体都潜藏着疯狂性,欲望英雄总是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主体不再是认知主体,它再也不可能确保它对于外物的恰当测量估算了,它不再成为一个中心点,万事万物不再汇聚于它的心中,供它思考、认知、判断、分析、作结,它不再成为一个焦点,成为天地中惟一的灵性,成为吞吐吸纳测绘大千世界的标尺。“我思”不再被看做是统一而绝对的起点,相反,主体内部,那个作为主体的标签的意识内部,则是盲乱而无形的;它颠三倒四,为所欲为。它是一个无政府式的器官,按照拉康的说法,主体内部出现了能指和所指的脱节。与其说主体是个运转正常的我思机器,毋宁说它是个失去控制的欲望机器。

主体刻写于语言之内,主体内部混乱而无序,这种卑微而盲乱的主体观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写作者的退场,作者不再被认为是文本的操纵者,与其说他控制、主宰着文本,主宰着世界,不如说他是文本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罗兰·巴特断言,在汪洋大海般的文本漩涡里,作者死了。然而,更为耸人听闻的说法是人之死,人即是“我思”意义上的主体。福柯发现,对于人类和知识来说,人不是最常见也不是最古老的问题,人只是近期的一个知识发明,知识并非总是环绕着人及其秘密而运作的,人的出现,人的产生以及有关人的全部概念和知识体系只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的某些瞬间诞生的,它只是偶然性的产物,是某种信奉人类中心论的知识形式的产物,既然它的出现是突然的,它的消失也将是指日可待的。

那么,这种漫长的历史是不是片断式的、不可预料的、断裂的?正是如此。后现代理论对那种线性历史不以为然。线性历史观旨在缝合历史的缺口,它将历史纳入规律性的轨道,它监测历史的足迹,标出历史进展的曲线图。在这种曲线图中,依据重复,依据起伏,依据想象而成的因果律,还依据一些剪裁、省略和毫无憾意的对细节的冷漠忽视,历史就构成一种顺势而下的江流。历史背后耸立着的是理性动力,这样一种历史被赋予一种平衡性、稳定性、连接的惯性和惰性,它是可以预料的,是可以被学科知识测绘的,各

种各样的编撰史因而就有其完备的律令、细则和信心,因而也就有了历史学的合法性和基础。古典历史学的信念即是统一性、连续性和规则,它对此深信不疑:在纷乱的碎片中,有一种隐蔽的质的同一性,这些碎片正是在这一点上才可以朝着一个方向聚集起来。

这样一种历史观与后现代理论的历史观不折不扣地对立起来。对于后者来说,历史的碎片仅仅是碎片而已,每一个碎片都有完全的自足性,它们之间既没有一根彼此牵连的逻辑绳索,也没有一个巨大的统一性支配潜能。历史,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历史,都充满着沟壑、断裂、歧路、迷途。历史不是会聚式的,不是有方向感的,不是有目的的和规律的,不是和着韵律节拍的,当然也不是一个强力意志颇费心机地操纵编排的。历史充满着机遇、偶然,它是零碎、散乱和细节式的。它总是忽然变向,出尔反尔,躁动不安,反复无常;它一会儿和风细雨,一会儿剑拔弩张;一会儿缓缓前行,一会儿大步流星。历史的步伐永远没有节拍,历史的成分也永远不是同质性的。它充满着杂质,充满着各种各样无法区分的调料,充满着众多的冲突、抵牾、纠纷、矛盾。没有一种同质性的历史,只有一种喧哗而骚动的历史;没有一种秩序井然的历史,只有一种歧路芜杂的历史;没有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只有一种细节和片断的历史;没有宏大的历史,只有具体而微的历史。

这样,历史编撰学——它有某种系统本能——毋庸置疑地就充满着冷漠的表情,它对细节视而不见,对异质性熟视无睹,对他性进行排斥流放。历史编撰学依据的不是具体性,而是想象般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伴随着压抑、偏见、好恶,它还充满着人工意图、策划和阴谋,它是选择性的,功利性的,它充满着省略。在历史教科书的背后,还有沉默的部分,还有有待申诉的部分,还有地底岩浆,还有一个巨大的、无法被吞噬和吸纳、也永远不可能被吞噬和吸纳的隐晦角落。这就为福柯式的考古学设下了使命,考古学不是别的,它正是要使那种历史中的沉默体、边缘体、异质物重现、出声,要让它们呼喊或细语,要让一切怪异物合法化。

这种总体性历史当然是书写的,它构成一种压迫式的知识形式。历史和知识正是统一于叙事中,叙事是二者的结合面;历史编撰采纳的是叙事形

式,知识采纳的也是叙事形式,存在着某种叙事形态的总体性历史,也存在着某种叙事形态的总体性知识。利奥塔将这种总体性知识称之为元叙事,他还明确地断言,后现代正是对于元叙事的质疑。叙事依赖于历史哲学,它将它的缓慢演进拴寄于真理,拴寄于合法化规则,拴寄于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结构紧凑,环环相扣,步步推演,知识依赖于某种严密的工具论展开,它的起点是威权,是公理,是不容置疑的基础知识,因而,这种宏大叙事的派生物是同质性的,因果性的,逻辑性的。后现代知识正好是对任何一种合法化的质疑,是对启蒙知识、理性知识、可通约知识的极度不信任,是对大理论的拒斥。后现代知识信奉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游戏,信奉差异,信奉歧义,信奉多元性,信奉微观性。局部知识无须借助于宏大叙事,无须借助于共识、真理和普遍性,它不再依赖于规则、标准、原理,它不再在解放、幸福、科学的巨型迷信中徜徉。相反,它的潜能是史无前例的实验、生产、求新,它容忍而且激励任何一种异质性。正是在此,少数派的知识,无法纳入普遍通约性的少数话语,应享有存在的权力,应享有公正的位置,它们不应被漠视、被出卖、被利用、被异化、被压制,这样,这种知识的差异拜物教,在政治上所引发的后果就是对极权主义的诋毁——极权主义的哲学核心则是不折不扣的普遍主义,它压制和迫害一切非议、歧见、悖谬。而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极权主义总是埋藏着一个巨大的合法性基石,正是这个基石,构成总体性迷信。在政治上——如果我们非要将后现代性引入政治中的话——后现代性开启的空间是那种旧式的古老的自由主义,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局部的自由主义,因为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主体、理性等自由主义要素消失了,我们现在回到的主体不是认知主体和真理主体,而是欲望、本能式的主体,是一个丧失古典主体性的主体。与其说这是个主体,不如说这仅仅是个躯体,这样,我们再一次回到身体上来。我相信,从哲学和认识论而言,后现代性正是以绝对的差异来回击形而上学和总体性;从政治、实践以及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而言,它即是以身体来对抗主体,身体也许是后现代性或明或暗的真正目标,真正的焦点所在。

后现代性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这同时包括科学迷信和上帝迷信。

后现代知识观即是对科学迷信的破除,它属于后现代的认识论;后现代身体观即是对上帝迷信的破除,它属于后现代伦理学。上帝不再仅仅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了,在此,它是多位一体的圣祠,它同时包括本质、起源、理性、真理、灵魂,而身体正是对这一切的狂暴冲击;身体,以其肉体性,以其感性,以其瞬时性,以其自然性,以其大地性,以其享乐性,聚结为后现代的火药筒,最终爆炸式地摧毁了形而上学体系。

后现代性的使命,它的伟大的历史实践,就是要让身体回归身体,让身体重享自身的肉体性,让身体栽植快感内容,让身体从各种各样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于是,这样的后现代目标——我们称之为这个时代的伦理学目标——就具有硬币般的两面性:它既是摧毁性的,又是生产性的。福柯的理论堪称摧毁性的,它具体而微地摧毁了各种各样对身体的规训机器,这包括律法、监狱、理性以及无处不在的控制性话语实践;德勒兹的理论则是生产性的,身体在此则是永不停息的欲望机器,它活力四射,外溢莽撞,它是一架脱轨的无人驾驶的高速列车。欲望行动在本质上不是弥补性的,不是对匮乏的填充,相反,它是冲动性的,生产性的,它的气质是狂野,它的行为是胡作非为,它的领域是游牧,它的节奏是奔突,它的风格是革命,它的使命是解放。结果,永远流动的欲望机器冲垮了一切既定的秩序,不论这种秩序采纳的是什么形式,只要它是僵化的形式。就此,欲望机器最终生产的是一个欲望乌托邦,身体乌托邦,快感乌托邦。

后现代性正是这样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以一种反希望的形式构想了希望,以一种反伦理的形式构想了伦理,以一种反上帝的形式构想了天堂。

汪民安

1999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后现代性的谱系	1
---------	---

福柯/德勒兹

人文科学	米歇尔·福柯著 马海良译	1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节选)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伽塔里著 王广州译	36
何谓哲学·导言	吉尔·德勒兹著 王广州译	59

德里达/解构主义/《泰凯尔》

延异	雅克·德里达著 汪民安译	67
书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	雅克·德里达著 陈永国译	95
过程中的主体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著 陈永国译	120

拉康主义/女性主义

镜像期:精神分析实践中所揭示的“我”的功能构成		
	雅克·拉康著 汪民安译	173
弗洛伊德以来文字在无意识		
或理性中的作用	雅克·拉康著 陈永国译	180
非“一”之性	露丝·伊丽格瑞著 马海良译	214
话语的权力与女性的从属(访谈)	露丝·伊丽格瑞著 马海良译	222
模仿与性别反抗	朱狄斯·巴特勒著 赵英男译	235